

长安多荒冢 东南何森然

——西安大白杨西汉墓地考古工作的收获与认识



第一阶段典型陶器组合

第二阶段典型陶器组合

第三阶段典型陶器组合

第四阶段典型陶器组合



发掘全景



第二阶段典型陶器组合

“千岁单尊”印

铜器刻铭

大白杨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红庙坡街道原大白杨村东南，地处汉长安城东南角首塬高地上，历年多有汉墓发现。

本次发掘区应属大白杨墓地的核心区，北距汉长安城覆盎门约1.1公里。共发掘墓葬2000余座，其中西汉墓超过1700座，分布在约10万平方米的区域内，非常密集。西汉墓以小型墓葬为大宗，多为竖穴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洞室墓；葬具多为木质单棺，葬式以仰身直肢占绝大多数，流行单人葬，有一定数量的两人合葬；出土各类随葬品1万余件，多为普通陶器，包括仿铜陶器、模型明器和实用器。根据墓葬形制和器物特征，这批西汉墓葬的年代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第一阶段，墓葬形制多采用墓道宽于墓室的竖穴墓道土洞式和竖穴土圹式。陶器组合常见鼎、盒、蒜头壶、缶、罐、甗等。年代当在秦汉之际。

第二阶段，出现墓道与墓室等宽的竖穴墓道洞室墓。与第一阶段相比，仿铜陶器组合有较大变化，以施

红、白、紫彩的鼎、盒、缶为主，少见蒜头壶，陶房形盒为本阶段新见器类。年代约为西汉早期。

第三阶段，墓葬形制以墓道与墓室等宽，墓道窄于墓室的竖穴墓道土洞式和斜坡墓道土洞墓为主。除依然流行单人葬外，两人合葬墓开始出现。仿铜陶器以施红彩为普遍现象，并逐渐被陶器取代，基本不见房形盒，模型陶器以鼎、灶为主。年代约在西汉中期。

第四阶段，流行斜坡墓道洞室墓，多见两人合葬，墓葬内常见瓦当、瓦片、瓦钉等。仿铜陶器流行施绿釉，器盖、肩、腹模印浅浮雕图案。年代应为西汉晚期。

第五阶段，墓葬形制出现“复古”迹象，多见竖穴墓道洞室墓。器物组合、器形等与第四阶段变化不明显，但随葬种类多样的新葬钱币，如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货泉、货布、大布黄千、次布九百等。年代应为新莽时期。

本次发掘还出土了一些与墓主职业或身份相关的随葬器物，如玉料、职印、铜器刻铭等。玉料品质较好，基本都是治玉过程中的边角料，表明墓主可能为玉器作坊

的工匠。铜器刻铭和职印仅为个别发现，如“千岁单尊”印、“乐工作靳氏”器等，表明墓主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但不会过高。

总体来看，大白杨墓地为一处大型西汉墓地，以西汉小型墓葬为主体内涵，葬者当以长安城周边平民为主，其中可能包括玉器工匠和低级官吏。该墓地使用年代与西汉国祚基本一致，为研究西汉京师周边平民墓地的时空分布、小型墓葬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是复原古都长安西汉时期社会图景的重要素材。此外，本次发掘区域西北部广泛分布唐代大仓遗迹已被考古工作所证实，以西应为西汉覆盎门外大街，东部进入唐代禁苑范围。在发掘过程中，我们认真梳理前期周边工作成果，保持问题导向，兼顾找寻唐大仓南界、汉大街东界和唐禁苑西界的学术目标，发掘证实了上述三处重要遗址并未延伸至本次发掘区域，对进一步明确各自分布范围提供了重要参考。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执笔:邵晶 陈少兰 于朋飞)

阳曲地区古城址调查取得阶段性成果

2023年,山西省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开展了太原盆地昭余古湖历史地理环境及其演变研究课题与太原地区先秦古城址调查项目。本次调查依太原盆地地形,沿文化线路由北向南逐一调查,调查线路北端的阳曲盆地内的早期城址便是此次工作的第一站。在本次调查中,已完成对狼孟古城址的全面调查与勘探工作,以及城晋驛村、洛阴村、故县村、古城村、石岭关等地的现场调查工作。

狼孟古城遗址,位于阳曲县黄寨村东北的台地上,四面高崖,北临杨兴河,古城依台地而建,外表形态与台地边缘高度重合,呈南北走向的平行四边形,目前古城地表可见东城墙南段、西城墙北段与南城墙东段。东墙长325米,残墙与城内地表高差从2.7米至地表不等;南墙略呈弧形,长231米,残高0.2~0.6米;西墙北段有长约56米的地上连续墙体,残高1.2~4.5米,外侧有一处马面,因长期侵蚀呈圆丘状;北墙原沿崖壁修建,现因黄土崖壁坍塌而完全消失。现存城墙外侧夯土剥落严重。古城遗址周长约1050米,面积约60910平方米。

经探沟调查可知,城墙曾有修补,早期城墙厚3.5米,晚期修补,高逾4.8米,分段夯筑,每段长3.5米,夯层厚9~11厘米。东南角有一处角楼残基,平面呈正方形,边长约3.2米,残高5.6米,外表剥蚀明显,夯层厚度与东城墙一致,残基上未发现建筑遗迹。在南城墙中部地表下1.9米处,勘探发现南墙门遗址,门宽4.1米,进深4.4米,城门外,勘探发现南北向道路,路宽约2.4米,路面覆卵石;其他三处城墙未发现城址。

城内表土下为宋金时期地层,可见酱釉瓷片、白瓷片等;宋金地层下为战国至魏晋时期地层,出土有弦纹灰陶片、陶纺轮残块、骨骨等,其中在东南城墙勘探所得弦纹陶片,与晋阳古城三号建筑基址、晋阳古城晋源苗圃两处发掘结果中战国至汉代出土灰陶片形制相同。据此可知此城建设时间当不晚于战国,北朝至唐初依旧在使用,宋金时期城内有人活动。

此外,调查组还在古城遗址周边符合《水经注》所载地形细节之处约500万平方米范围内进行调查,未发现其他战国至汉代大型古城遗址,由此可进一步确定此遗址即为狼孟古城。狼孟古城,在《汉书》《晋书》《水经注》等古籍中均有记载,为战国时赵国所筑城邑,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年)为秦所占,秦始皇十五年(前232)左右置县,属太原郡,汉、魏、西晋相因袭,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不再作为县治。本次调查中,发现战国西汉时期陶片、古城南门遗址、西城墙马面等,确定了史书中关于狼孟古城的相关记载。狼孟古城遗址虽面积较小,但其东南角楼与西城墙的一处马面依旧留存,可知其不仅是县治所在,其军事要塞的功用要大于其政治中心的功用。角楼与马面,是汉代城市的重要防御措施,在北方多见于边疆地区,在此之前,山西汉代的古城拥有马面者,仅苗庄古城一处,但此城未经考古发掘,仅能通过地表遗物推测其为汉代所建。此次发现,是山西目前极为罕见的汉代角楼和马面遗址,亦揭示了狼孟古城在历史时期重要的军事地位。

城晋驛古城遗址,位于阳曲县黄寨镇城晋驛村。该村自宋金时起便为驛道重镇,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认定环城城墙为明代遗存。在本次调查中,通过对城墙的细致调查,发现明代城墙是在早期城墙基础上增补而成。城址呈矩形,西墙上夯层、夯窝明显,早期城内侧残高1.3米,残长31米,厚约半米。外侧夯层明显,高2.7米,厚6米,长约225米。北城墙外侧为明代增补,内侧情况与西城墙基本相同,长约360米。东城墙目前保存情况良好,外侧被晚期城墙包裹,未见早期遗存。南城墙几乎全数被毁。早期城墙其夯筑工艺、夯土内夹陶片形制均与狼孟古城遗址调查结果相同,或为汉晋时期所建。

2023年,在村西南200米处配合基础设施建设,发现数座汉代至魏晋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葬为太原地区已发现规模最大的西晋墓。该墓群与古城遗址时代相同且相距不远,两者之间关系有待进一步调查。现有文献中,并未记载城晋驛在宋代之前有城址。本次的新调查结果,表明在汉晋时期这里已有城邑,已成为该区域文化线路上的重要节点之一,校正和补充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资料。

洛阴城遗址,位于阳曲县东黄水镇洛阴村,分为西洛阴村、南洛阴村和北洛阴村三处自然村。该城始见于北魏时期文献记载,隋唐时为军府,唐初曾短暂设罗阴县,是阳曲县—东黄水镇—孟县文化线路上一处重要的古城址。本次调查中,在南洛阴村中央黄土台地上发现数处夯土墙遗迹,文化堆积厚约2米,其中包含物多见抹杀绳纹陶片。台地东侧,发现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长约50米,距地表约2.5米,其地层堆积和包含物与中央台地早期地层一致,推断为汉代城的东向西向道路。现南洛阴村委会北面台地,遗有隋唐时期广化寺建筑基址,该寺的重要遗存隋代《洛阴修寺碑》,今存放于太原纯阳宫,碑文为隋唐时期军府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广化寺基址周边区域地表,分布很多绳纹陶片,村北200米处发现一条长14米的夯土墙遗迹,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洛阴早在汉代已有人定居,其筑城时间应早于现有文献记载的北魏时期。

洛阴城遗址北2.1公里处,在东黄水镇故县村。据道光《阳曲县志》与《太原府志》相关记载,该村为汉代以后孟县治所。本次调查中,在村西一处台地边缘新发现古城遗址,残存北、东、西三面城墙,其中东北角有保存最好的马面,墙体高约,颇具气势,夯土坚实,土色纯净,北墙夯土内夹有成排的木筋,未见到其他杂物。北墙残长约50米,东城墙30米,墙高约2~10米。此处城址周边地表采集到素面灰陶片,可证实此地至魏晋隋唐时期曾有城邑,可能与村名“故县村”有一定关联。

故县村遗址与洛阴村遗址,同为东黄水地区早期重要城邑位置所在,是阳曲县唐代之前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两座古城的建设、兴盛与衰落,或与此处东黄水的流量变化、小气候变化导致的文化线路变迁有着密切关系。

古城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位于阳曲县大孟镇古城村以西,系舟山支脉山麓台地上。本次调查中,在村西台地新发现一处史前文化遗存。此处文化遗存,以村西二广高速东西两侧的40万平方米高台为核心,所涉及区域南北1076米,东西1390米,面积超过150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太原盆地内面积最大的史前聚落遗址。核心台地上有多处灰坑、墓葬遗迹,地表可见大量泥质、夹砂陶片、实心锥状瓮足、假腹豆残片、石斧、骨骨等,核心台地西侧有一处环壕遗迹。地表采集遗物,时代从仰韶时代延续至汉晋时期,龙山、早商和汉晋时期遗物尤为丰富;此外还发现了一片原始青瓷残片。该遗址除被高速公路穿切区域外,均未受到破坏,整体保存良好。

此次新发现的古城村遗址,其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遗物之丰富,均为太原盆地所罕见,其丰富的内涵或可为太原地区史前至商周考古序列的建立提供重要支撑。我们计划将此项调查工作深入下去,继续探查遗址区的文化堆积、夯土建筑、城墙道路等遗迹,进一步明晰遗址存续期的规模、范围、布局和人居生活变迁情况。另外,东周至汉晋时期陶器残片、建筑残件随处可见,目前可以明确知这处大型城邑的使用时间延续至东周汉晋时期,它是否就是文献记载的春秋晚期孟县地旺所在,有待下一步的考古工作揭晓答案。

石岭关,是太原盆地北三关(石岭关、赤塘关、天门关)中最重要的一座,位于太原盆地与忻州盆地的分界线上,自唐代以来便是太原北大门,唐、五代、宋、金、元时期均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存遗迹,主要为明代重修遗迹。本次调查中,在太忻大道以西的关城北内城、金岭寺南侧,新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土城墙,墙体残长29米,残厚约2米,残高4米,墙体黄土夯筑,夯层厚10厘米以上,偶见夯窝,夯土内夹有厚素面瓦残片,其夯筑工艺不同于汉代,亦与现存明代城墙有显著不同,当为石岭关早期建设遗迹。

本次调查工作,目前已取得众多收获,对于广泛开展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和古城址科学保护,深入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阳曲县文化和旅游局 执笔:王鑫 彭娟英)



陶炉(H36:2)

抔泥幻化 惟苏极巧

——江苏苏州陆慕宋泾桥南遗址考古新收获

2023年12月至2024年8月,为配合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的土地出让工作,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组织工作队对该区元和街道的一处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揭露出一处丰富的宋元至明清时期陶瓷窑业遗存,出土了大量制工精美的陶器、陶范等遗物。

陆慕宋泾桥南遗址位于元和塘东岸,距离苏州古城约2.7公里,距2016年和2019年南窑发掘点直线距离约300米,距2021至2022年陆慕老街发掘点约1.3公里。该遗址规模大,占地约1.1万平方米,延续使用长达七百余年,窑业遗存丰富。从本次发掘的情况,结合窑业的规模、性质、文化内涵及地理位置看,应属陆慕元和塘窑窑群的一部分。尽管后期生产建设对遗址的破坏较为严重,但仍发掘出土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特别是首次发现元代纪年材料,具有时间标尺意义和重要价值,填补了陆慕地区以往未发现明确的元代窑业遗存的空白,同时为研究和探索南宋平江窑与明清金砖窑之间的传承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从目前已揭露的情况了解,宋元时期窑业遗存保存较好区域主要集中在遗址西北角,面积约400平方米,局部被明清时期居住址打破,东侧部分被多个大小不一的现代垃圾坑打破,中部偏北区域被一条较长的东西向现代排水沟打破。遗址北部及西部为现有河道。

宋元时期遗迹主要由窑炉、灰坑、肥泥池、辘轳坑及水井等共同组成,均开口于③层下,相关文化层堆积厚度约0.35米,夹杂较密集的红烧土颗粒、烧土块和碎砖。遗物主要为陶礼(祭)器、陶塑、日用器及陶范等窑业产品,质地以泥质红陶为主,大件陶器多为灰陶或黑陶制品,伴出瓷器多见龙泉窑、景德镇窑及吉州窑之产品残片。现已发现宋元时期窑炉4座,均为小型窑炉,皆营筑于发掘区西侧的土岗上,并呈L形分布,部分遗迹向西侧延伸。

已清理的窑炉(Y14)是一座小型马蹄形馒头窑,窑门位于西北向,火膛呈长方形,因年代久远,窑体上部结构已坍塌。Y14残长1.20、残宽0.70、残高0.10米。炉壁为长条形香糕砖平砌而成,窑内堆积以草木灰为主,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及烧土块,窑壁及窑底还残存少量的烧结面。较为重要的是,在清理火膛及窑室之间的位置时,出土了3件陶塑,在窑室内还出土了2件陶筹。陶塑可辨造型有仙人、胡人及塔式建筑。该窑炉与1999年杭州老虎洞窑址发现的南宋礼器局窑炉造型、规模和砌筑形式均基本一致。

本次发掘出土的陶塑数量庞大,造型各异、制工精湛。多为人物类塑像,兼有少量建筑、器皿及神兽塑像,均系前后合范压制制成,小型泥塑的两侧均留有范线,底部还留有合范压制时留下的内凹状指纹印。其人物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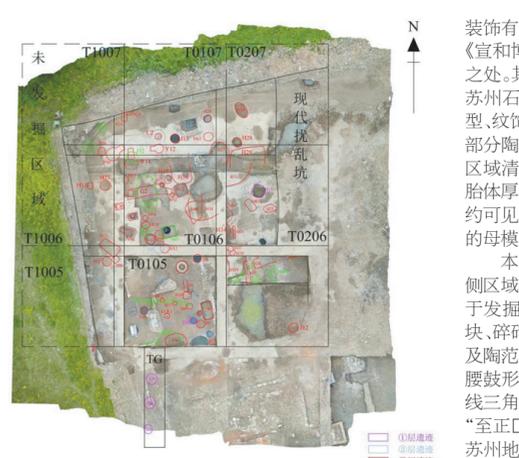


窑炉(Y14)



陶范

陶塑(T0107③:4)



北部发掘区正射影像图

塑像多为世俗化形象,可辨的人物造型有八仙、合和二仙、弥勒、观音及童子等,部分泥塑可能与文献记载的“磨喝乐”有关。磨喝乐,亦称“摩睺罗”,即以童子等世俗风物为题材的泥塑儿童玩具。据记载,苏州泥塑在宋代就已非常兴盛,南宋陈元靓在《岁时广记》曾写道:“(磨喝乐)南人目为巧儿,今行在中瓦子、后市街、众安桥磨喝乐。惟苏州极巧,为天下第一”;《方輿胜览》亦称:“(平江府)七夕磨喝乐:土人工于泥塑,所造磨喝乐尤为精巧”。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杭州、镇江、常州等地的宋元时期遗址内也曾出土过类似精美的泥塑人物,多为素烧品,部分泥塑身后戳印有“吴郡包成祖”“平江李文明”“平江孙荣”等款识,《浙江古代青瓷》亦披露杭州南宋临安城遗址曾出土过带有“平江谢兴祖塑”“平江谢荣昌”款识的器物。此外,位于苏州大石头巷的平权坊遗址也曾出土泥塑人物陶范十余件,但以上这些地点均未发现明确的制陶窑业遗存。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常州和平路出土的一批陶塑与本次的发掘品,不论是产品的质地和烧制工艺,还是泥塑人物的造型、风格及尺寸均高度一致。因此,我们初步认为常州出土这批陶塑可能就产自本次发掘的制陶作坊区。

除了数量较多的陶塑产品,仿烧青铜器类的陶礼(祭)器及陶范也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成果之一。可辨器型有鼎式炉、鬲式炉、奩式炉及贯耳壶等,其造型复古,并

装饰有云雷纹、夔龙纹、蟠龙纹及兽面纹等,与《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等传世金石学文献著录的器型多有相似之处。其中,T0106②b层出土的贯耳壶陶范,与2010年苏州石湖谢家坟M8(元朱道宁墓)出土陶贯耳壶的造型、纹饰、大小及质地均基本一致,初步推测该墓葬出土部分陶礼(祭)器即产自本次发掘的窑业区。Y10相邻的区域清理的一处灰坑(H36)出土了多件龙纹陶炉,器物胎体厚重,纹饰华丽精美,部分陶炉(H36:2)的纹饰间隐约可见刀具的修刻痕迹,初步推测可能是翻制陶范所用的母模。

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清理灰坑(H44)南侧区域时出土了一件元代“至正”款纪年陶范。该灰坑位于发掘区东侧,坑内夹杂大量红烧土颗粒及少量烧土块、碎砖块等,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陶瓷残片、陶塑、陶炉及陶范等器物。纪年陶范(H44:8)系左右合范的一侧,印腰鼓形器物造型,器内装饰有缠枝花卉纹、凸弦纹及斜线三角纹,中部方槽内印有铭文,从左至右读,阳体反书“至正□□年四月十四日置”等字样。元末,各方势力在苏州地区盘踞、鏖战,局势动荡不安。明钱谦益所撰《国初群雄事略》载:至正十六年(1356年)二月,诚王张士诚攻占平江(今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不久降元,旋即又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朱元璋大军攻破苏州,大周政权覆亡。故该处宋元时期窑业遗存的毁弃原因或与元末农民战争有关。

此外,在遗址的南部还发现有二十余座明清时期的窑炉,其中窑室直径超过5米的大型窑炉就有9座,还有与窑业生产配套相关的水井、池、沟及灰坑(取土坑)。从出土遗物看,主要为砖、瓦类产品,其中砖类产品包括金砖、城砖及一般建筑用砖;瓦类产品可分为“小式瓦作”和“大式瓦作”,其中“小式瓦作”为一般板瓦、筒瓦及瓦当,瓦当纹饰多样,其中不乏龙纹等具有等级标识的典型纹样;“大式瓦作”有脊瓦、脊兽或鸱吻等,相关器物体量巨大,为多组拼砌而成,均系陶范压制脱模制成,可能是用于大型官式建筑的屋脊构造。另在该遗址还出土了蟋蟀盆、灯笼等建筑,以及陶盆、陶灯、陶盏及陶碗等日用器,亦反映了明清时期元和塘窑业产品的丰富多样。

总之,新发现的宋元时期窑业遗存,上承南宋平江窑,下启明清金砖窑,是陆慕窑业发展史中的关键节点和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发现为进一步解决长江下游地区宋元时期陶礼(祭)器及“磨喝乐”的产地、烧造工艺、产品流转及窑业功能分区等问题提供了关键指引,也为研究和探索陆慕窑业的发展及平江窑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 执笔:陈璟 程义)